

阅 览

三晋石刻大全

晋中市灵石县卷

主编 杨洪
执行主编 任兆瑞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K877.402
201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 / 刘泽民总主编,
李玉明执行总主编—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457-0217-0

I. 三… II. ①刘… ②李… III. 石刻 - 灵石县 - 图录 IV.
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2253号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杨洪

执行主编: 任兆瑞

责任编辑: 落馥香

助理编辑: 谢瑞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址: <http://sjs.sxpmg.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承印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8

印张: 105.75

字数: 520千字

版次: 2010年7月 第1版

印次: 2010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7-0217-0

定价: 580.00元

ISBN 978-7-5457-0217-0



9 787545 702170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申维辰 申联彬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王庭栋 郭裕怀 白清才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刘 江 张 领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张国祥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郭双威 赵华山
梁俊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吴广隆 张鸿仁
陈长禄 高 可 崔正森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编：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张继红 落馥香

审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编纂指导组

顾问：李永宏 张 璞
主任：刘志宏 李年善

执行主任：杨二怀

成员：温毓诚 张定邦 王敏政 张晋平 李文艺
周丽萍 晋 华 郭绍华 武志远 阴崇民
郭润生 王俊山 武增亮 葛凤英 李文端

编审：张晋平 晋 华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编委会

主任：郭燕平 杨 洪
副主任：安振禄 王世强
委员：任兆瑞 杜瑞明 闫春成 孟贵生 张建新
景茂礼

主编：杨 洪

执行主编：任兆瑞

拓本：古 稔 薛俊鹏 孟海龙 吴志忠
碑文抄录：林木盛 任 敏 相中英 景茂礼
点校：任 苑 吴香莲 任 捷 孟靖直
实地拓片拍照：任欣影 李文寿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新中国成立前后凡在《三晋石刻总目》中存目并补充遗漏和新发现的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布施碑，根据历史、文化价值并有助于当地古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原则，慎重选择收录。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和墓志铭，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一般分三大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与附录。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篇内容一般包括石刻名称(全称)、简介、石刻录文(全文录入并断句)。元代(含元代)以上的石刻每通(件)配黑白照片或拓片若干张(全景和特写)，明清以后石刻遴选重要者配拓片和照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首先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然后再简介石刻。

八、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九、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十、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一、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

(627)。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二、碑刻规格单位,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高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又如高120、宽60厘米,高也不加“厘米”。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主要是为了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其余均使用规范汉字。

十四、每卷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等,保持原貌,一般不作甄别。

十五、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括注“下阙”。

十六、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检索,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辘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首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赑屃）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殷》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寗、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厍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的原

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碑碣、墓志铭等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最多时究竟有多少石刻,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撷,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补遗拾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的特点是不能再生性,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法,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地上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的《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之碑刻,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加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省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原晋中市人大副主任 杨二怀

“盛世修志，盛事勒石”，极言修志刻石之至要也。修志即纪史，史可鉴古知今，晓谕后人，但由于历代史官自身的局限性或某些客观原因，使有的史书中许多记载史料不实、不全，甚至存在明显的差错。一旦形成定论，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唯同一时期的石刻、碑碣等，由于其内容涉及面相当广泛，几乎囊括各个层面的各种社会状况，且秉笔直书，史料翔实，可以证史之真伪，补史之不足，进而纠正史书之舛误。历史上通过碑碣、墓志等刻石取得佐证，澄清史实，进而辨别真伪及疑案、悬案的事例，比比皆是。由是，访求石刻成为许多史学家、方志学家和文化学者的终身爱好，历来为有识者所重视。

晋中市地处三晋腹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各类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仅就石刻而言，不仅门类齐全，而且跨越时间长，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指导下，已陆续编纂了《晋中碑刻选粹》和《三晋石刻总目·晋中市卷》。前者辑录选拓上自北魏下迄民国的各种碑刻共计463通，乃晋中碑刻之精粹；后者收录与前者同一时期各类石刻目录计2474条（晋中市现存碑刻总量约在3000通以上）。虽不敢言已悉数收录和发掘，但其不失为一笔宝贵财富，对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晋中”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些石刻、碑帖中，不乏珍品佳作，其中有些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明洪武年间的《新修十八盘并天井郊城堡图碑》、明万历年间三彩琉璃烧造的《空王佛行宫碑记》和《空王殿建修碑》，唐代的《汾州抱腹寺碑》、《李光进神道碑铭并序》和《李光颜神道碑铭并序》等。此外，还有许多碑帖都是书法艺术价值极高的稀世珍品，如清初傅山隶书《郭泰碑》、清中期祁寯藻行书《祁氏支祠碑》、民国时赵铁山楷书《太谷重修大观楼记碑》、常旭春楷书《朱子治家格言刻石》等。尽管如此，由于条件所限，仍有大量有价值的碑刻未被采撷，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所喜者，近年来由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各县（市、区）分别遴选的一批精粹石刻，已陆续编录出版。

在此基础上，灵石县有志于此的同志们继续整理和研究金石碑刻，从收录、拓印、点校到编辑成书，他们几经寒暑，甘守寂寞，淡泊名利，不遗余力，终于按照三晋文化研究会《三晋石刻大全》之要求，编纂成《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其中甘苦，非亲历者不能察也。其精神令人钦佩，感铭至深！古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信哉斯言！

谨此数语，聊以为序。

序二

灵石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 洪

碑石是石刻史书，碑石文是历史的写真。其珍贵的历史价值，独特的文化品位，开放的传播方式，古往今来备受敬崇。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摩崖石刻，从秦开始，碑石文渐兴。汉以后国势强盛，碑石文遂大为兴盛。之后在民间出现，唐、宋、元、明渐成气候。直至清朝为鼎盛时期，修建庙宇要树碑，成就公益要立碣，重大事宜要示众，游记诗文要镌刻，碑石文化风靡一时。由此碑石遂发展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和直观的史实载体。

在乾隆年间的一篇碑文中写到，“静升为灵邑文物之乡”，距今已二百四十余年。由此可见静升历史文化之悠久，同样也说明我县历史文化之悠久。事实也正是如此，旌介商代遗址就说明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十一世纪该地域内就有人类居住。数千年来形成了以静升为代表的我县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古碑文是会说话的石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和纪录了我县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的社会内涵。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对研究我县社会具有重要的补充和见证作用。纵观所收集的600余篇碑石文，从不同角度记载了我县诸如灾害、战争、社会、立学等历史事件。如元大德七年(1303)的地震，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北虏犯岚县至晋阳，达我县“屠戮之惨殆不忍言”。又如所收集的乾隆二三十年间的禁赌碑文多达十余篇，足见当时赌风之猖獗和人民禁赌之决心。再如蒜峪村始设异姓义学，卜子夏在我县西河底村设教等史实，均见诸碑文。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对研究我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目录看，碑石几乎遍及全县大小乡村，可见庙宇之多，范围之广，足见乡民之富庶。从碑石文可以看出我县在乾隆年间商铺、字号多达千余，说明当时商贸之昌盛。如记载南北通衢之地两渡镇冷泉村时，称该村在盛朝时“盈盈居民千家，列通显者有人”，“富商巨贾，指不胜数”，“食天禄者常不下数十百人”，可见昔日之繁荣。追其原因，实为交通便利之缘由。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不仅有其史学价值，亦有其文学价值。由于篇幅所限，碑文所用文字甚少，所以用语相当精炼。为文者不是高官显贵，便是当时当地社会名流。其记人记事，言简意赅，用词用句，恰到好处。细读篇篇碑文，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还是一部书法艺术集。它展示着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的书法艺术。凡能刻到碑石上的书法大都是当时当地的书法名流，笔力功底可见一斑。尤其是尚存的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长白铁保的墨迹，实为珍贵。

我觉得《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本集文史资料和历史研究资料于一体的好书。希望我县有识之士能更多地涉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使之为今所用。

是为序。

概 述

灵石县位于山西省中部、晋中市最南端，东与沁源县隔山相望，西和交口县毗连，南与霍州市、汾西县为邻，北同孝义市、介休市接壤，距省会太原仅 150 公里、首都北京 725 公里，素有“秦晋要道，川陕通衢”之称。全县国土面积 1206 平方公里，辖 6 乡 6 镇 291 个行政村，总人口 25.1 万。位列中部百强县（市）第 61 位和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第 44 位，是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的百强县市之一。

据明万历版《灵石县志》记载：“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地广，分为冀、幽、并三州。灵石时未有名，在并州之域。历夏、商、周相因无改。自晋文公追封介之推以绵上之田，介休始得名，及晋大夫弥牟邑介，灵石实其舆地。战国属魏、赵。至秦郡县天下，遂为太原郡地。两汉俱如之。曹魏属西河郡。晋属西河国。后魏置定阳郡，改介休县为平昌。北齐置南朔州，后州置介休郡，灵石之民咸隶焉。隋开皇十年，文帝驾幸太原，傍汾河开道获一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为瑞，遂于其地建设县治，割介休西南地以益之，仍属汾州。唐武德元年改属介州。乾元初复属汾州，隶河东道。五代因之。后为辽所有，复归于宋。靖康后陷没于金，属汾阳军。元改属霍州，隶平阳路。大德后州、路数易名，而县名无易。”所以，灵石和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碑石留下了它的足迹。

灵石境内名胜古迹众多。20世纪 70 年代在旌介村发现了厚达三米的仰韶—龙山文化和东周时期文化堆积，并抢救性地发掘了商代、汉代古墓葬，并出土了大量文物。2003 年静升镇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命名为首批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并位列榜首；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 4A 级景区王家大院，以其独特的三雕艺术和恢宏的气势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千年古刹资寿寺以十八罗汉头像失而复得蜚声海内外；“灵石”，为全国第二大铁陨石；厦门古堡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闻名遐迩……这一切形成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我县范围内，古庙宇随处可见，可以说有村就有庙，而古碑石又大多存于古庙，所以碑石也遍及全县。据全县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全县大小庙宇多达 320 余座。现收集到的 600 多通（方）碑石几乎完好无损。最早的为北魏正光元年的造像碑，距今 1510 年之久。现存碑石大多为清代所树，多达 400 余通，占现存的 80%。由于全县庙宇甚多，修建庙宇所树碑石也多，占到现存的 70% 以上。其他记事、告示、题刻等仅占 20% 有余。就碑文而言，内容颇为丰富，有地震、旱涝、立学、植树、修路、建桥、战争、堡巷、游题等，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碑石史料。其书法艺术也很有借鉴、欣赏价值。如清代书法家翁方刚、长白铁保、太原傅山等的题刻，令人耳目一新，拍手叫绝。据说长白铁保的墨迹传世不多，而灵石却有长篇墨迹，实属珍贵。长白铁保的墨迹为梁中靖之父梁绘星所书。当时长白铁保为进士出身光禄大夫，官为吏部、礼部尚书。梁中靖为嘉庆辛酉进士改庶吉士，官为吏部员外郎。二人交情甚深，故为笔书。此外，捐资布施的商铺号、人名等，也为我们研究历史经贸、家族世系等提供了可靠史料。

古碑石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所见所闻，破坏相当惊人。据收录时乡民告知，全县碑石总数不下千数，可惜至今仅存一半。就在整理此书时，有的碑前面抄录尚在，后面拓印时则已不见。主要原因是人为的破坏。少数人保护意识淡薄，埋没损毁。为此，应投入人力财力加以保护。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全民保护意识。二是有关村委予以集中保管。三是有条件的地方统一保管，或建立碑廊（林），一以保护，二以

观赏。四是禁止个人收买碑石，同时打击盗窃变卖碑石的犯罪分子。

总之，碑石存世的意义非同一般，保护碑石是一件无愧先辈、有益后人的大好事。愿我们共同努力，让古碑石永垂不朽，与世长存。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杨二怀
序二	杨 洪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北魏·宋·金·元

北魏造像碑(北魏正光元年)	(五)
资寿寺大宋受公预修幢题记(宋咸平二年)	(七)
重修洁惠侯庙记(金泰和五年)	(八)
重修洁惠侯庙记(元至元十二年)	(九)
斯者重建洁惠侯庙碑(元延祐七年)	(一一)
梧桐村葫芦头重建广禅侯庙碑(元泰定元年)	(一二)
重修可汗庙碑记(元至正六年)	(一三)
重建洁惠侯庙记(元至正二十二年)	(一五)

●明

文殊原村庙碑记(明洪武二十三年)	(一九)
重修资寿寺碑记(明成化三年)	(二〇)
重修三清岩碑记(明成化二十年)	(二二)
重修兴国寺碑记(明弘治七年)	(二三)
资寿寺药师佛殿碑记(明弘治十二年)	(二五)
重修河东公祠记(明弘治十七年)	(二六)
东逻村柏山寺禁作贱碑记(明正德二年)	(二八)
平阳府霍州灵石县静升里重修古庙碑记(明正德五年)	(二九)
重修重建观音堂碑记(明正德五年)	(三一)
重修商山圣母庙碑记(明正德六年)	(三二)
建水陆殿碑记(明正德十一年)	(三五)
贊关圣贤序(明正德十一年)	(三七)
重修资寿寺正殿记(明正德十六年)	(三九)
葫芦头重修广禅侯庙碑记(明嘉靖十年)	(四一)
冷泉镇修寨记(明嘉靖二十二年)	(四三)
“仁义”匾(明嘉靖二十五年)	(四六)
修三清寨砖门碑记(明嘉靖二十五年)	(四七)
灵石县东曲里西村瑞云观羽士杨公志(明嘉靖三十五年)	(四九)

冯家堂村重修寺殿碑记(明嘉靖三十五年)	(五〇)
改建佛堂碑记(明嘉靖三十七年)	(五一)
增修保安禅院碑记(明隆庆五年)	(五二)
重修鼓楼碑记(明隆庆六年)	(五四)
集广村重建道场碑记(明万历元年)	(五五)
旌介村重修观音庙记(明万历元年)	(五六)
温家沟村重修庙碑记(明万历七年)	(五八)
建立庙碑记(明万历二十三年)	(五九)
温家沟村增修庙碑记(明万历二十九年)	(六一)
重修资寿寺碑记(明万历四十年)	(六二)
重修晋祠庙碑记(明万历四十七年)	(六四)
资寿寺创建尊天阁碑记(明天启二年)	(六五)
灵石县为禁约事碑(明天启七年)	(六六)
旌介村创修堡记(明崇祯六年)	(六七)
西许村玄帝庙置地碑记(明崇祯十五年)	(六八)

●清

天竺寺碑记(清顺治六年)	(七二)
集广村增修堡只碑记(清顺治六年)	(七三)
颂德防奸碑(清顺治十五年)	(七四)
清宫尚冠近侍讳养清字登甲何先生义田记(清顺治十七年)	(七六)
增修下岩白衣大士玉庵禅院碑记(清顺治十八年)	(七七)
静升村创建魁星楼碑记(清康熙元年)	(七八)
重建观音楼碑记(清康熙二年)	(八〇)
南关村重修观音庙碑记(清康熙八年)	(八一)
东逻村柏山寺碑记(清康熙十三年)	(八二)
静升村重修文庙碑记(清康熙十四年)	(八三)
军营坊村景姓义举碑记(清康熙十四年)	(八五)
资寿寺金妆碑记(清康熙十五年)	(八六)
重修三官庙记(清康熙十七年)	(八八)
重修极乐庵经理碑记(清康熙二十年)	(八九)
观音堂重修乐亭东廊记(清康熙二十六年)	(九〇)
重修碑记(清康熙三十三年)	(九一)
军营坊村创建道场碑记(清康熙三十四年)	(九二)
资寿寺药师殿碑记(清康熙三十六年)	(九三)
草桥村重修观音堂碑记(清康熙四十四年)	(九四)
土地庙记(清康熙四十五年)	(九五)
旌介村□□高家圪塔新建仁和堡碑记(清康熙四十七年)	(九六)
重修牛王子孙圣母庙碑记(清康熙四十七年)	(九七)
静升村捐金修复崇宁堡碑记(清康熙四十八年)	(九九)
重修关帝庙记(清康熙五十一年)	(一〇〇)
新修神庙碑记(清康熙五十一年)	(一〇一)
重修碑记(清康熙五十二年)	(一〇二)
施茶小引(清康熙五十三年)	(一〇三)
皂角墕村补修神庙碑记(清康熙五十九年)	(一〇四)

仁义村创修茶房碑记(清雍正二年)	(一〇五)
创建菩萨神庙碑记(清雍正五年)	(一〇六)
静升村创建崇宁堡碑记(清雍正六年)	(一〇八)
石膏山重修天竺寺碑记(清雍正八年)	(一〇九)
夏庄村重修观音庙碑记(清雍正十一年)	(一一〇)
移修商山圣母庙碑记(清雍正十一年)	(一一二)
下庄村重修善院龙王阁碑记(清雍正十三年)	(一一四)
东逻村重修柏山寺碑记(清乾隆元年)	(一一五)
重修井碑记(清乾隆二年)	(一一六)
仁义村禁窑碑记(清乾隆三年)	(一一七)
柏王庙重修碑记(清乾隆三年)	(一一八)
修渠碑记(清乾隆五年)	(一一九)
常家山村修设土地庙碑记(清乾隆五年)	(一二〇)
金旺村三教庙重修碑记(清乾隆七年)	(一二二)
圪塔村施地碣(清乾隆八年)	(一二四)
峪口村修土地祠碑记(清乾隆八年)	(一二五)
贊坟茔地碑(清乾隆九年)	(一二六)
重修龙天庙可汗庙碑记(清乾隆十年)	(一二八)
金妆碑记(清乾隆十年)	(一二九)
杨家堙穿井碑记(清乾隆十一年)	(一三〇)
重修菩萨庙碑记(清乾隆十三年)	(一三一)
创建观音堂关帝行宫碑记(清乾隆十三年)	(一三三)
尹方村建方升庄碑记(清乾隆十三年)	(一三四)
尹家沟村创建山西夫子庙碑记(清乾隆十四年)	(一三五)
庄立村重修菩萨土地祠碑记(清乾隆十六年)	(一三六)
皂角墕村补修观音菩萨庙碑记(清乾隆十六年)	(一三七)
葫芦头村创修窑楼碑记(清乾隆十六年)	(一三八)
尹方村建土地祠碑记(清乾隆十七年)	(一三九)
辿道窊村创建庙碑记(清乾隆十七年)	(一四〇)
静升村创建拱极堡碑记(清乾隆十八年)	(一四一)
尤家山村尤户创建祠堂碑记(清乾隆十九年)	(一四二)
创建关圣帝君庙碑记(清乾隆二十年)	(一四三)
重修南亭西廊碑记(清乾隆二十一年)	(一四四)
灵沁古道修路碑记(清乾隆二十一年)	(一四五)
梁家庄村三官庙移修牌楼新修石渠碑记(清乾隆二十六年)	(一四六)
程家庄村禁赌碑记(清乾隆二十六年)	(一四七)
漫河村禁赌碑记(清乾隆二十八年)	(一四八)
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清乾隆二十八年)	(一四九)
重修观音庙碑记(清乾隆二十八年)	(一五一)
旌介村重新朝阳庵南殿碑记(清乾隆二十九年)	(一五二)
王家岭村移尊神碑记(清乾隆二十九年)	(一五三)
静升王姓合户公议不许寄葬老幼妇碑记(清乾隆二十九年)	(一五四)
阖村禁赌割禾碑序(清乾隆三十年)	(一五五)
杨家山村禁赌窃禾碑(清乾隆三十年)	(一五六)
蕃义村继述碑记(清乾隆三十年)	(一五七)

赵家庄村整修牛王庙碑记(清乾隆三十年)	(一五九)
静升村创建和义堡碑记(清乾隆三十年)	(一六〇)
静升村建桥碑记(清乾隆三十年)	(一六二)
陈家岭村建关帝庙碑记(清乾隆三十三年)	(一六三)
柏苍村禁赌碑记(清乾隆三十四年)	(一六五)
合村重修碑记(清乾隆三十四年)	(一六七)
灵邑核桃窑村重修白衣庵土地祠碑记(清乾隆三十五年)	(一六八)
静升村钟灵巷井楼碑记(清乾隆三十六年)	(一六九)
段家庄创建周将军庙碑记(清乾隆三十七年)	(一七〇)
静升村增修眼光菩萨庙碑记(清乾隆三十七年)	(一七一)
旌介集广静升三村公立水利碑记(清乾隆三十七年)	(一七二)
蒜峪村修理西门外路碑记(清乾隆三十九年)	(一七三)
西许村“周槐”碑记(清乾隆三十九年)	(一七四)
蒜峪村创建永宁桥碑记(清乾隆三十九年)	(一七五)
重修马棚并东西茶房舍宇五岳殿舍宇并塑像碑记(清乾隆四十年)	(一七六)
郭家庄村加修三官庙碑记(清乾隆四十年)	(一七八)
灵石县文学里西庄村重修乐楼序(清乾隆四十年)	(一七九)
静升村重修孙氏祠堂碑记(清乾隆四十二年)	(一八〇)
“三村公立”碑(清乾隆四十四年)	(一八二)
静升村重修锁瑞巷捐银碑记(清乾隆四十四年)	(一八三)
严家山村禁赌碑记(清乾隆四十四年)	(一八四)
创建二井楼碑序(清乾隆四十四年)	(一八五)
己亥岁赈饥碑记(清乾隆四十五年)	(一八六)
创建石狮记(清乾隆四十五年)	(一八七)
尹方村重修土地庙东马房碑记(清乾隆四十五年)	(一八八)
尹方村增建白衣阁前檐碑记(清乾隆四十六年)	(一八九)
静升村补修后土庙碑记(清乾隆四十六年)	(一九〇)
延安村补修圣母殿碑记(清乾隆四十七年)	(一九一)
集广村东头井墙碑记(清乾隆四十八年)	(一九二)
重修石膏山碑记(清乾隆四十八年)	(一九三)
拥翠巷重修瓮门照壁井楼碑记(清乾隆四十八年)	(一九四)
补修三官庙碑记(清乾隆四十八年)	(一九五)
新修茶房碑记(清乾隆四十九年)	(一九六)
重修龙天三官商山庙新建乐楼碑记(清乾隆五十年)	(一九七)
尹方村水井碑记(清乾隆五十年)	(一九九)
静升村朝阳堡修葺碑记(清乾隆五十年)	(二〇〇)
张家山村修庙记(清乾隆五十年)	(二〇二)
梁氏祖茔创修垣墙记(清乾隆五十二年)	(二〇三)
鲲池恤族记(清乾隆五十三年)	(二〇四)
冷泉村新修车路碑记(清乾隆五十四年)	(二〇五)
公议常规(清乾隆五十五年)	(二〇六)
仁义村补修三官楼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二〇七)
道阡村砌石渠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二〇八)
进士王公教泽碑(清乾隆五十六年)	(二〇九)
王家岭村修建瓮门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二一〇)

任家掌村增修三官庙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二一一)
刻傅征君承颜堂额书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二一二)
重修菩萨庙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二一三)
灵石颂并序(清乾隆五十七年)	(二一五)
创修神坛乐楼碑记(清乾隆五十八年)	(二一七)
逍遙村渠規碑記(清乾隆六十年)	(二一八)
蒜峪村設立異姓義學碑記(清乾隆六十年)	(二一九)
重修資壽寺新建寺南財神樓碑記(清乾隆六十年)	(二二〇)
趙家庄村重修廟碑記(清乾隆六十年)	(二二五)
重修東岳廟碑記(清乾隆六十年)	(二二七)
延安村公議禁約碑記(清嘉慶元年)	(二三一)
葫蘆頭村栽樹碑記(清嘉慶元年)	(二三二)
靜升村花消銀兩碑記(清嘉慶三年)	(二三三)
補修土地神祠叙(清嘉慶三年)	(二三四)
重修廟碑記(清嘉慶三年)	(二三六)
重修介廟子孫殿牛王殿碑記(清嘉慶四年)	(二三八)
祠堂碑記(清嘉慶五年)	(二三九)
補修龍天廟碑記(清嘉慶五年)	(二四〇)
創建安濟橋碑序(清嘉慶五年)	(二四一)
姚家坡村三官廟碑記(清嘉慶六年)	(二四二)
增修碑記(清嘉慶六年)	(二四三)
西河底村重修觀音堂募化碑記(清嘉慶六年)	(二四四)
重修觀音堂碑記(清嘉慶六年)	(二四五)
移修關聖帝廟記(清嘉慶七年)	(二四七)
靜升村兩戶爭地畝判定碑記(清嘉慶八年)	(二四九)
東許村補修菩薩樓碑記(清嘉慶九年)	(二五〇)
馬江村重修龍王聖母廟碑記(清嘉慶九年)	(二五一)
成家寨上村修廟舍地碑記(清嘉慶九年)	(二五二)
集廣村補修橋道碑記(清嘉慶十年)	(二五三)
移建菩薩廟碑記(清嘉慶十年)	(二五四)
常家山村重修佛祖廟碑記(清嘉慶十年)	(二五六)
重修永寧橋碑記(清嘉慶十一年)	(二五八)
道美村渠道碑記(清嘉慶十一年)	(二五九)
補修祠堂碑記(清嘉慶十一年)	(二六〇)
重修可汗廟碑記(清嘉慶十二年)	(二六一)
靜升村補修關帝廟碑記(清嘉慶十二年)	(二六三)
邑侯京兆吳公元韵(清嘉慶十三年)	(二六四)
靈石贊(清嘉慶十三年)	(二六五)
資壽寺新建殿東角門碑記(清嘉慶十三年)	(二六六)
靜升村崇寧堡補修堡牆碑記(清嘉慶十三年)	(二六七)
修石堤碑記(清嘉慶十三年)	(二六八)
張家山村補修廟碑記(清嘉慶十三年)	(二七一)
修道碑記(清嘉慶十三年)	(二七三)
岩村補修廟碑記(清嘉慶十三年)	(二七五)
候補兵马司副指挥王培凡施地碑記(清嘉慶十三年)	(二七六)